

## 大运河第一锹，是在哪里挖下的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从此被今人称为“大运河”的一脉活水在中国大地上蔓延流淌，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延续最久、航程最长、成就最高的古代人工运河。

据《左传·哀公九年》记载：“吴城邗，沟通江、淮。”意思是说，吴国修筑了邗城，又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两大水系。这也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份的运河。扬州是中国大运河的“原点城市”，那么，在2500年前，中国大运河的第一锹是在哪里挖下的呢？

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扬州。在瘦西湖北边的蜀岗脚下，扬州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原大运河联合申遗办专职副主任姜明立告诉记者，蜀岗东侧从螺蛳湾桥到黄金坝间至今保留着一条1.45公里东西向的邗沟故道，这是大运河系统最早期的遗迹之一，从汉代至唐代这段河道都是大运河的主航道。主流的学术观点认为，当年的邗城就修筑在蜀岗上，是吴国为北上而建的一座军事堡垒。而为了兵力和物资运输而开凿的邗沟必定就在邗城周边，因为长江岸线南移，今天蜀岗已经在长江以北15公里远，但在春秋时期蜀岗就在长江边上，吴国战士站在高高的蜀岗上瞭望着远方，江水就在他们的脚下拍打着岸边。吴国人引长江水入邗沟行船，最便利的施工路线就是在蜀岗脚下开挖河道。

这一观点被写进《大运河申遗文本》，并被提交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时，考古发掘专家也倾向于这一观点。对长江岸线的研究表明，春秋时长江北岸线就在蜀岗南侧，那里直到地下2000米都是黄沙层。中国社科院扬州唐城考古队在蜀岗上对唐代和宋代扬州城遗址进行了多年考古，虽未发现春秋时期的邗城遗址，但在蜀岗南麓西侧发现一个“城门”，上方是宋代的甬门，下方是战国时期的水门，而在蜀岗北麓也发现了战国遗迹。考古界倾向于认为这里是战国沿用至汉代的广陵城遗址。酈道元《水经注》明确记载，邗城在广陵城的东南，城下开挖了邗沟，因此考古队认为邗城很可能在蜀岗东南麓。

照此推测，中国大运河的第一锹应在扬州蜀岗周边挖下。然而邗城遗址究竟在哪里，目前仍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扬州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顾风认为，长江与邗沟的交界处很可能在更西边的仪征地区。他告诉记者，广义的蜀岗是一条山脉，东至江都区，西至仪征市，当时就是长江的北岸线，扬州蜀岗位于蜀岗山脉的中段。在西周至春秋时期，仪征是一个较为发达的区域，那里发现过疑似诸侯的墓葬。伍子胥自楚奔吴就是在仪征的胥浦渡过长江，可以说扬州境内早期南北交通廊道就在仪征境内，那里至今还有甘笋山、神墩、荷叶地、郭山、虎山等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址，是一个四通八达之地，因此夫差取道仪征的可能性同样非常大。

吴王夫差开的邗沟，取邗沟故道一路向东至茱萸湾，然后向北经过武广湖（今邵伯湖）和陆阳湖（今高邮湖）之间，下注樊梁湖（今高邮湖），然后折向东北，流经博芝湖（今宝应东湖）、射阳湖（宝应、淮安东），出来郭（不详）再折向西直到淮安末口。

据估算，这条路线的长度达三四百公里，吴王夫差为什么要开挖这么大的工程？原来，在击败了越国和楚国之后，吴王夫差决意北上中原争霸，如果不开挖运河，军队和物资只有从海路才能到达山东，而海上风狂浪急，风险太大，于是他决定开挖邗沟，使船只可以从长江沿运河安全北上进入淮河，再逆流而上挺进中原。如果说泰伯奔吴的故事反映的是中原文明向南方的扩散，那么夫差开邗沟北上，则是周边文化主动融入中原文化的一个注脚。

邗沟开挖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85年，吴国与鲁、邾、郟等国联合攻打齐国，吴王夫差亲率主力由邗沟入淮水北上，同时派遣大夫徐承率师南师，由长江入海，吴、齐水军在今山东琅琊台附近的海域爆发大战，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海战。吴军海战失败，夫差退兵。

公元前484年，吴国派军经邗沟与鲁国联合攻打齐国，在艾陵之战大败齐军，鲁、卫、宋等国都则顺吴国，诸侯为之震动。

公元前482年，夫差率领精兵数万乘舟出邗沟北上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县以南的黄亭），与晋国会盟，并以武力相威胁而成为盟主。

黄池会盟是夫差个人成就的顶峰，也是吴国盛极而衰的转折点，就在黄池会盟国内空虚的时候，越王勾践发动奇袭攻克吴国都城，俘获吴太子，等夫差沿着邗沟回到吴地时已无力回天，只好求和。吴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473年，在经历3年的围城之后，夫差向勾践投降，并被自杀，一代霸主就此陨落。这时的邗沟被勾践所用，他率领舟师北上，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桐山（今徐州铜山区），并派遣使者向周元王进贡，周元王派遣使者任命他为“伯”，正式承认了越国地位，各国纷纷来祝贺，勾践借机成为春秋时期的又一位霸主。

可以说，邗沟为夫差北上争霸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吴国灭亡埋下了伏笔。黄池会盟前的10年内，夫差就经历了4次战争，耗尽全力，败亡是必然，但是他开掘邗沟却开了中国大运河开凿之先河，为中国东部的南北沟通奠定了基础。（源自《新华日报》）

## 丰子恺嗜蟹

丰一吟

有不少人以为我父亲是吃常素的，理由是他画过六册《护生画集》，提倡爱护动物，不杀生。

父亲确实吃过一时期的素，但后来就开荤了。他对荤菜有所选择，只吃鱼虾蟹鸡鸭之类，不吃猪牛羊羊肉。好像他不吃四条腿似的，其实也是偶然。

而我呢，吃荤的范围比他更窄，不吃牛羊肉和螃蟹，只吃瘦猪肉和蛋，连鱼和鸡鸭也勉强吃。尤其是蟹，不仅不吃，还很害怕。

父亲装了假牙以后，蟹钳咬不动了。在家里还可以用榔头敲敲，到外面去吃蟹就不行了。在杭州时，有一次他到王家和酒店去吃蟹酒，我陪在一旁，他要我替他咬蟹钳，我实在有点害怕，但命运难违，只得勉强屏住气替他咬了。以后我曾几次向父亲，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吃蟹？煮蟹的时候不是很残忍的吗？父亲点点头，承认是那么回事，但他无可奈何地说：“腹之欲，无可奈何啊！”接着又补说一句：“单凭这一点，我就和吼一犬师有天壤之别了。所以他能爬上三楼，而我只能待在二楼向三楼遥望。”

父亲吃蟹是“祖传”的。他在《忆儿时》一文中详细描述祖父吃蟹的情况，最后说：“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当时他正茹素，后来开了荤，就恢复了“永远神往”的吃蟹这件事。可见“腹之欲”还是很难克制的。

父亲吃蟹的本领是跟祖父学的。他和祖父一样吃得干干净净，蟹壳里绝不留一点蟹肉。我看了觉得惊奇，这时他便得意地说：“既然杀了这只蟹，就要吃得干净，才对不起它！”他反复地说这句话，好像是为他的吃蟹作辩解，或者是对内疚的补偿。

父亲每次吃蟹，总是把蟹钳头上毛茸茸的两个东西合起来做成一只蝴蝶。吃几只蟹就做几只蝴蝶。所以一到金秋季节，我家墙上总是贴满蝴蝶。



看来蟹这样东西一定很美味，否则父亲怎么会那么喜欢呢！我有许多荤菜不吃，人家都说我损失很大。但我“自得其乐”，我吃素菜时那种津津有味，不比父亲吃蟹差。看来“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只要不是对人体有害的食品，谁爱吃什么，就让他去吃吧！

年接待观众“10亿+”  
博物馆缘何成为“网红打卡地”？

近年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走进博物馆，观看特色十足的展览，已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种生活方式。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2019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14732万人次，比上年增长9.9%。

为什么博物馆一年能吸引“10亿+”人次前来参观？它在丰富人们公共文化生活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博物馆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的终极目的，是点燃观众的情感，激起共鸣，培育同理心。”复旦大学博物馆馆长、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教授郑奕在接受人民网文娱部记者采访时说。



## 历史剧应该多一点现实主义

抗战题材电影《八佰》近日上映，逼真再现了那段烽火连天、国破家亡的岁月。

我们的国度从来不乏英雄。近代以来，在致力于救亡兴亡的荆棘路上，约有2000万英烈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英勇牺牲。“八百壮士”“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台儿庄血战”等事迹，凝聚着这个民族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是值得永远传承的精神财富。文艺作品本身肩负着记录历史的使命，艰苦卓绝的抗战史也成为文化现象，一批优秀作品引起强烈共鸣，而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就在于创作者老老实实地从细节抓起，以尊重历史为基础创造出了艺术真实。

眼下，国产影视市场每年上映400余部电影，播出上百部电视剧，可谓是高度繁荣，但经得起各种检验和审视的经典不多。尤其在战争

**免费开放 贴近百姓日常生活**

当前，我国绝大部分博物馆都已实现免费开放。2019年，中央财政继续支持包括博物馆在内的“三馆一站”等公共文化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人们走进博物馆看展的门槛已降至“0元”。

对于博物馆免费开放，郑奕也有自己的看法。“希望通过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让大家逐步养成参观、使用博物馆的习惯，喜欢并热爱博物馆。如果有可能，日后再以各种方式‘反哺’博物馆。”郑奕说。博物馆免费开放，迎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并在与观众日常观展的磨合中改进服务，不少博物馆在常设展之

外还努力探索引进特设展，为观众带来数量众多、文化多元的展览，满足人们对文化生活多样性的需求。

**“千馆千面” 专业策展各具特色**

“一个博物馆就是一所大学校”。博物馆不仅是历史文化的“存储器”，也参与构建着新的历史文化。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抗击疫情纪实展，以主题展览的形式将公共事件转变成了公共记忆的一部分。

博物馆历来都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之一。在郑奕看来，近年来博物馆不断努力提升可达性和可及性，让每个进入博物馆的观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博物馆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的终极目的，是点燃观众的情感，激起共鸣，培育同理心。”郑奕说。

**技术赋能 足不出户“云端”看展**

把博物馆搬上“云端”，将藏品数字化，是近年来各地博物馆发展的趋势。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博物馆的数字化进程，网络看展逐渐从辅助方式转变为常态化活动，“云端”成为博物馆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主战场”。

如今，全景制作、虚拟现实、5G直播等数字技术在博物馆中的运用，为无法到达现场的群众提供了观展的便利。在郑奕看来，博物馆在数字化方面的努力，最大的贡献在于“让博物馆有机会为每个人提供教育和文化服务”。

近年来，使用博物馆网站、通过信件或邮购方式购买博物馆文创及周边商品的观众和游客大幅增长。“这一方面反映了博物馆网络市场规模巨大、潜力无限；另一方面也倒逼博物馆在数字化道路上夯实硬件和软件的双重建设，这也是未来博物馆完善、提升服务的重点之一。”郑奕说。

（源自人民网，本报刊登时有删节）



## 中国价值观的「心胜」

这次中国的成功抗疫过程中最打动人的地方，是无数普通中国人身上体现出来的诸多品质，这些品质体现了中国人所信奉的许多宝贵价值，这些价值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它们应该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价值。这些价值的提炼可以极大地增强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甚至形成一种对西方价值的压倒优势，形成一种价值观上的“心胜”。

这次战疫过程中，我们提出的“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它可以成为一种普遍价值。通过中西方抗疫模式的对比，我们发现，原来天天高喊人权和“普世价值”的那些西方国家，居然没有中国人人都懂的“人命关天”的理念，居然不认同“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我们不惜成本地抢救每一个生命，与西方国家经济利益优先，罔顾人性的“群体免疫”和放弃救治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无数中国人这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生活在这个最尊重生命的国度是多么的幸运。对于整个世界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人权教育吗？连生命权都不尊重的国家居然有资格给中国人上人权课？坦率地说，这使中国民众获得了一种久违的“价值优越感”，使中国自信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

中国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要真正讲好中国故事，我们不能满足于各种分散的中国元素，如功夫、旗袍、绿茶、茉莉花，等等，而是要重视整体的、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崇尚的价值观念。

“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众志成城，共赴国难”“责任担当”“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中国人的这些价值观念，有利于解构西方的“道德优越感”，形成我们自己的道德“心胜”。这不是傲慢，而是实事求是。我们发自内心地认为中国人的这些价值观念比西方崇尚的许多价值观念更具人性，更加符合人类的整体利益，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们带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属于整个人类。

我们的中国叙事应该进入理念层次，我们的文化和精神作品要以文载道，这些中国价值观念及其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可以打动我们自己，也可以打动世界上大多数人民，成为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特殊贡献。当然，体现这些价值的文化和精神产品一定要有品位，有温度，有国际视野，唯有这样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世界卫生组织这次肯定中国的抗疫经验创造了世界抗疫的新标杆，这本身也隐含了对中国价值观念的肯定。如果没有这些价值观念，就不会有中国创造的这种新标杆。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今天正在以某种形式重新界定现代性。现代性过去一直是西方的专利和特权，但随着中国抗疫模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肯定，这意味着新的现代性开始涌现：一个21世纪的现代国家，其政治制度就是需要具备迅速反应能力、领导指挥能力、综合协调能力、社会动员能力，否则其国民就无法享受真正的自由和权利；其信奉的价值观念应该是“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是精诚团结、自由与自律的平衡，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等，否则就难以被看作是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

（摘自《中国战疫》，本报刊登时有删节）

笔筒出现在明朝中期，迄今不足五百年  
明朝笔筒，作为“文房第五宝”的后浪

古代文人书房皆有四宝，笔墨纸砚，但在现代某些收藏家眼里，笔筒可被称为“文房第五宝”。相比前面四位历史悠久的前辈，笔筒出现在明朝中期，迄今不足五百年，在传统文具家族中可谓后浪。后浪后来居上，与前浪一同跻身“文房五宝”，其中又有怎样一段历史渊源呢？

“笔筒”一词首次现身于三国时期陆机所著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中：“取桑虫负之于木空，或书筒笔筒中，七日而化。”此处笔筒形制模糊，后世学者猜测或相当于笔筒套，与现代意义上的笔筒无涉。一般来说，笔筒的嫡系前辈，历史排得上名的约有笔架、笔格、笔床、笔船，南北朝时便有记载。

笔架与笔格皆造型立体，属同类，形状各异，但不外乎临摹世间风物。文震亨在《长物志》中记录的笔架款式，有子母猫型、十二峰型、卧莲娃娃型等，他认为最俗气的是“以老树根枝，蟠曲万状，或为龙形，爪牙俱备者”。但不论大雅大俗，这样一座座精雕细琢的笔架置于书桌，兼具实用与装饰，历来都颇受人欢迎。

笔床与笔船，形制类似，为长方形的平卧式器物，内设凹槽，用来固定毛笔。看“架”（或格）和“床”（或船）的称谓便知这两套器具的区别，一个是站着的，一个是躺着的，若说毛笔在笔架为搁，在笔床上只能是卧了。所以当更为简单实用的笔筒流行以后，笔架因其挺立的轮廓、多变的造型，还能在工艺品领域占得一席之地，而形制扁平的、发挥空间不大、存在感不强的笔

床，只能逐渐退隐，至明朝，如文学家屠隆所言，“笔床之制，行世甚少”。

明朝中期，现代意义上的笔筒出现。笔筒兴起之初，多以竹木为材质，如文震亨所言，笔筒，以湘竹、栝桐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尤其是竹。在古代文人审美中，竹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截竹为筒，既文艺风雅，又绿色环保，还不花钱，还能在圆柱形的笔筒筒身自由发挥，制作出山川风物，寄寓了自己的情怀。所以，笔筒的出现及流行，与明代文人精细的生活情趣脱不了干系。

就功能而言，明末文人朱彝尊在《笔筒铭》中明确了这款新秀的用途：“笔之在案，或侧或倾，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放放心，归于无邪。”作为收纳毛笔的器具，笔筒形制简单，材质不拘，又携带方便，取代笔架、笔床已属必然，所以笔筒诞生后，受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贫寒寒士的广泛喜爱，很快赢得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随着笔筒的潮流，明中叶以后涌现了一大批竹刻名家，他们在笔筒的方寸之间精雕细琢，将功能性且价格低廉的笔筒，变成真正的艺术品。现存年代最早的笔筒，是南京博物院所藏的松鹤笔筒。明朝隆庆五年，竹刻大家朱松邻的好友过寿，他给好友做了一个笔筒。他戴一段老松，挖空制筒，又在筒身雕刻了精美、繁复的松鹤拜寿图，并题款：“余至武陵，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笃于气谊之君子也。岁之十月，为尊甫照伯先生八秩寿，作此奉祝。辛未七月朔日，松邻朱鹤。”

笔筒材质不惟竹木，还有瓷质、象牙等，尤其当笔筒作为礼物在上层社会流转时，材质及制作工艺可能比笔筒本身更重要。在文震亨记载中，他认为陶瓷笔筒以及定窑白瓷竹节笔筒最为珍贵，当真是文人意趣。但权相严嵩可不这么看，当他倒台时，从他家查抄出的笔筒，是牙镶棕木笔筒、象牙牛角笔筒、犀角碎瓷笔筒等，这些现代人都闻所未闻，徒在历史记载中留下一个幻影。

因出现时间晚，当我们说“历史上的笔筒”时，只限于明清两朝，也因此，留存于世的笔筒中，“明代制造”可谓占据了半壁江山，也因此，笔筒的历史虽不足五百年，可一旦现身，却炙手可热，稳居“文房第五宝”。（寇研）